

主 编/胡俊卿
副主编/韩茂全 李本安

时代 的 全火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纵横谈

白山出版社

责任编辑：耿树新

封面设计：赵连志

责任校对：罗达奎 刘仲宁

ISBN 7-80566-398-X



9 787805 663982 >

ISBN7—80566—398—X / D · 157

定价 6.00 元

时代的圣火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纵横谈

主编 胡俊卿
副主编 韩茂全
李本安

白山出版社

(辽)新登字 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的圣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纵横谈/胡俊卿主编
沈阳：白山出版社，1994.7
ISBN7-80566-398-X

I. 时… II. 胡… III. 实事求是一研究—文集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8328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110013

大连陆军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8.5 印张 18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一版 1994 年 7 月(大连)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耿树新 责任校对：罗达奎

封面设计：赵连志 刘仲宁

印数 1—3000

ISBN7-80566-398-X/D·157

定价：6.00 元

目 录

导言：“我是实事求是派” (1)

当西方一些人纷纷猜测他是哪一派的时候，这位有着“三落三起”传奇经历的“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自豪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从历史之鉴中汇聚出的时代的圣火。

上 编 历史之鉴

第一章 模式的诱惑 (12)

1.1 正统的模式 (12)

政治局委员严肃地讨论企业生产哪一种标号的水泥；皮鞋和内衣要由中央来调配；政府“有计划”地使价格背离价值。凡此种种，奇怪吗？一点也不。“苏联模式”的产生，还是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吧。

1.2 悲剧性的裁判 (17)

列宁的后继者们自认为掌握了社会主义的“正宗”，挥舞着“国际主义”的大棒。南斯拉夫首先被赶出“大家庭”，中国也遭了殃。

1.3 模式化的歧途 (22)

“命运的拨弄”使“小弟弟”们纷纷效法“老大哥”，可“老大哥”的一套不管用了，终于在多少年后酿造出一颗难咽的“苦果”。

第二章 教条的桎梏 (27)

2.1 本本的教条化 (27)

大胡子的马克思科学地绘制出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可他的后继者们天真地以为在现实中简单“复制”一下就行了，结果却违背了科学，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

2.2 引经据典的思维 (32)

本本中有的才敢做，本本中没有的不敢做。经典作家被当成“算命先生”，现实的人们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干什么都要先问问导师。我们能做什么？

2.3 “红宝书” (36)

语录本、语录歌、语录仗，语录的“红海洋”。邓小平大喝一声：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第三章 阶级斗争的迷雾 (41)

3.1 扩大化的斗争 (4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极少数人蠢蠢欲动。反右是对的，不幸的是扩大化了，并且上了“庐山”。

3.2 “继续革命” (46)

过去我们“革”反动阶级的“命”，现在“革”谁的“命”？“革”来“革”去却搞错了对象，把自己“革”进了一场灾难。

3.3 “纲”举“目”不张 (51)

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举错了“纲”。“革命”抓起来了，经济愣是上不去。

第四章 东方“乌托邦” (57)

4.1 “公社化”的乡村 (57)

包吃包住包穿衣，多么令人神往。可愿望毕竟是愿望，建设也不是打仗，无情的现实终于打碎了一场梦。

4.2 “共产主义大学校” (63)

人人亦工亦农，又亦文亦武，还要限制“资产阶级法

权”。可社会发展自有它客观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是想割就能割掉的。

4.3 “贫穷的社会主义” (67)

穷了要革命，这是对的，但是富了则变“修”？如果社会主义和贫穷画了等号，马克思会怎么想？

第五章 意志的陷阱 (72)

5.1 盲目的“跃进” (72)

“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比苏。良好的意愿代替了科学的精神，“大跃进”带来了大倒退。

5.2 诗化的激情 (77)

没有诗的生活是乏味的，没有激情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可工作一旦成了作“诗”，真的卫星能上天吗？有谁见过250公斤一棵的大白菜？

5.3 “能动”的精神 (83)

两位老朋友在谈论着哲学，意义却早已超出抽象的思辨领域。人们的“胆”能有多大？“精神原子弹”能摧毁物质吗？

第六章 “左”的迷信 (87)

6.1 根深的“左” (87)

不能包产到户！《人民日报》发出警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左”的根子还深扎于历史之中。

6.2 越“左”越“革命” (91)

一对本来只是表示方位的概念，被赋予政治的意义。“左”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历史却把“革命左派”们扫进了垃圾堆。

6.3 “左”得出奇 (96)

今天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物不分公私你我，孩子都是大家的，只剩下老婆属于自己。且慢，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悲乎？喜乎？种种“左”的闹剧，搬起石头砸了自己。

下 编 现实之光

第七章 回到大地的怀抱 (104)

7.1 念念“真经” (104)

一篇讲述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文章居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谁是“真高举”？谁是“假高举”？念念“真经”吧。

7.2 一体化的精髓 (109)

本是浑然一体，偏要把它分离。还我理论真面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合一”。

7.3 走出僵化 (115)

思想僵化，亡党亡国。走出僵化，另有一番新天地。

第八章 走自己的路 (119)

8.1 历史的坐标 (119)

我们越过了“卡夫丁峡谷”，不能越过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面的“退却”，真正的进步。我们终于找准了自己在历史坐标中的方位。

8.2 追求中国特色 (123)

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3 走出一条新路 (127)

虽然年事已高，思想依然年轻。邓小平有多少个“第一次”？试验有风险，实践出真知。踏踏实实走下去，就是

一条新路。

第九章 走上实践的法庭 (133)

9.1 拿事实来说话 (133)

包产到户刚开始推广，阻力重重。邓小平说：让事实教育他们！结果，什么语录标准、习惯标准、权力标准、意愿标准，都得接受检验，实践获得的事实最有说服力。

9.2 没有特殊的公民 (137)

在实践的法庭上，人人是平等的。谁可以不接受实践的裁决？马克思接受了，毛泽东接受了，我们也得接受。

9.3 真正的“法官” (142)

60年代初，几位老农质问领导：“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最富于创造力。谁对谁错，他们的眼睛亮着呢。

第十章 “好猫”的标准 (148)

10.1 彻底的唯物主义 (148)

一句四川俗语成为邓小平一大“罪状”，可又是这么实实在在地讲出一个真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能不承认它吗？

10.2 到底姓什么 (153)

姓“社”还是姓“资”？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在问不问，而在怎么解。

10.3 不妨引进“波斯猫” (157)

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的一个发问引出了一段精辟的哲理。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不行？世界上的许多东西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

第十一章 高奏经济“主旋律”..... (162)

11.1 只有一个主题 (162)

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反“和平演变”的根本在哪里？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吧，顽固一点又何妨？有了实力，谁敢来“演变”你？

11.2 发展战略的“三步曲” (167)

被邓小平称赞为“了不起”的苏州达到了小康水平，全国也在为“翻两番”而努力。“三步走”的战略是切实可行的，只是别忘了抓住时机、讲求效益，还有农村这块“广阔天地”。

11.3 科技“协奏曲” (172)

在一次只使用英语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李政道博士打出的第一张幻灯片是中文的，上书邓小平的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经济靠什么？唯有科技的“协奏”，世界经济“擂台”上才能响起中国的凯旋曲。

第十二章 抓住看不见的手..... (177)

12.1 无形胜有形 (177)

有形的计划之手孤独地挥来挥去，首钢人“赶了个晚集”，安阳人也哭笑不得。无形的市场之手轻轻一拨，无锡成为“第一县”，安阳人又喜笑颜开……唉！挡不住的诱惑，躲不开的擂台。

12.2 只不过是手段 (183)

市场取向的改革孰是孰非？有人要同商业部长“商榷”。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因为有了计划而变“红”，社会主义中国也没有因为有了市场而变“黑”。找哪个本本都没用，手段就是手段。

12.3 有手心,也有手背 (187)

雨花台烈士陵园办起了“狗展”,烈士们能安息吗?看不见的手也不要伸得太长了。你有管不好的地方,也有进不去的“禁区”。

第十三章 别忘了另一只手 (192)

13.1 文明、不只是物质的 (192)

徐洪刚捂着流出体外 50 厘米的肠子,招呼人们抓歹徒。这是一只正义的手,呼唤着精神文明的新风。不要忘了邓小平发出的警告: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幺意义?

13.2 给法律女神以威严 (197)

银幕上的秋菊讨到了说法,现实中的“庄主”跌进了监狱;“505”的发明人胜诉了,却是按名誉权案判的;还有一个市人大代表神秘地失踪,两个市的法官在“打架”……政治、经济、社会,都期盼着法律女神伸出强硬的手。

13.3 向腐败的“毒瘤”开刀 (202)

邓小平说:杨小民的案子“处理得好”。围绕着这一案件,人们可以嗅到某些人腐败变质的气息。还有那养了三个情人的银行行长,收受巨额贿赂的公安局长,先后上了“断头台”。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决非危言耸听。

第十四章 还要讲实干 (207)

14.1 治治“官僚病” (207)

干一件事要盖 270 个或 391 个公章,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相互扯皮,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我们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要耗在其中?

14.2 形式主义要不得 (211)

各种“节”多了，不免有“滥竽充数”；会议多了，不只是老百姓坐不上卧铺；空话多了，连野猪都唬不住；新瓶子竖起来了，装的却是老酒……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还会带来新的浮夸。

14.3 实干兴邦 (216)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表现的成果却是实干出来的。胶东“不信邪”，不是发展起来了吗？广东不缺“笔杆子”，就是不跟你打“笔官司”，不是一直走在前列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第十五章 实事求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221)

——代结束语

15.1 一条连续的金链 (221)

实事求是，我们党像金子一样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战争时期的创造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恢复发展，铸就了一条连续的金链。

15.2 各具特色的思维 (226)

他们都肩扛着实事求是的大旗。但是，在他们的阐述中，积淀着历史和时代的风云，打下个人和社会的烙印。

15.3 继续伟人未尽的探索 (232)

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有经验，更有那歧路曲折。从挫折中奋起，把实事求是的圣火彻底地点燃，开创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时期。

注释 (240)

后记 (258)

导言：“我是实事求是派”

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

——邓小平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对邓小平作了电视采访。当这位世界著名的记者问道：“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邓小平坦然地回答：“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2]

是的，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他特别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真正成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

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3]正是由于有了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作思想基础，邓小平形成了求实、务实的无华作风和坚强、坚韧、不屈不挠的刚强品格，使得他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左”的东西深恶痛绝，使得他在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时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他“三下三上”的传奇经历，赢得了“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4]的美誉。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5]

1932年7月，邓小平出任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这时，他已参加革命10年了。关于这以前的革命历史，他在1984年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回忆道：“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6]

然而，邓小平在会昌中心县委这段时期的工作，遭到由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把持下的临时中央的否定。临时中央指责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罗明是当时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罗明积极地提出在闽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把红军向敌人力最薄弱的地区发展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主张。由于临时中央所奉行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进攻路线”，罗明的主张就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临时中央开展

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运动。

实际上，反“罗明路线”就是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临时中央虽然在组织上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支持，他们对王明“左”倾错误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其代表人物，在福建，就是罗明，而在中央苏区，则是“邓、毛、谢、古”。

邓小平在领导会昌中心县委工作时，坚持从实际出发，拥护并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反对过“左”的土地政策和削弱地方武装以单从数量上扩大红军的过急要求，积极主张在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主张“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作战方针，主张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等等。所有这些，使得执行“进攻路线”的临时中央极为不满。于是在反对“罗明路线”过程中，把在江西的邓小平，与同样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道，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面对“左”倾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等四人没有屈服，两次写出声明书，陈述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并把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污蔑攻击和其他不实之辞顶了回去。这种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于是，继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后，邓小平刚接任的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给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的东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7]。

这就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下”。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就是在中国革命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所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一直记在心中，以致在 70 年代邓小平重新工作时，毛泽东讲的第一个历史功绩，就是“他在中央苏区是握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8]。

随着对“左”倾错误的纠正，邓小平也回到领导岗位，出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一“上”就是 30 年，横跨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两个时期：从《红星报》的主编到刘邓大军的政委，从西南地区的主管到国务院的副总理，从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到“八大”的总书记……

“……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9]

1956 年，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到了 60 年代初期，他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10]。然而，在 1966 年 8 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就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

被列为邓小平主要“罪状”的，一个与 1962 年的“单干风”和“翻案风”有关。60 年代初期，在农村许多地方又一次出现“包产到户”的热潮。这对于解决“人民公社化”以来所出现的

种种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克服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积极意义确实很大。邓小平对此是坚决赞同的。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1]然而，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被视为对“人民公社”的否定，是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风”。邓小平所提出的本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思想，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理论根据”的“猫论”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此外，根据 1962 年“七千人大会”精神，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但是，这些又被指责为“翻案风”。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各大院校发生乱批乱斗乱打的混乱现象。当时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学校派遣工作组，并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然而，在许多学校发生一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康生等人趁机向毛泽东谎报情况，加给工作组种种罪名，以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这时，毛泽东也改变了对工作组的看法，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指责派出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12]。尽管刘少奇、邓小平放